

會戰鬥的南洋「野草」

——論雲里風的《野草》仿作*

張康文**

摘要

1930至1970年代，魯迅無疑是馬華文壇最具影響力的中國現代作家，而其影響有待進一步挖掘。本文嘗以1950年代馬華作家雲里風的《野草》仿作為對象，分析其改寫特色及背後的歷史意涵與寫作訴求，從中觀察馬華作家與魯迅的關係。本文將論證，《野草》作為集中體現魯迅複雜思維、詩意和黑暗面的作品，如何在雲里風筆下被戰鬥化、明朗化，以因應殖民與冷戰情境。晚近，文學的跨境之旅及特定時空下的文學變異在在受到關注。南洋《野草》即演繹了巨大的轉變，其框架、主題、基調均被改頭換面，文體也從散文詩向雜文偏移，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個案。

具體操作上，本文先簡述馬新殖民情境，進而以前人較為忽略的報刊雜誌材料，描述知識人如何將魯迅形塑成反殖鬥士。在此基礎上，本文轉向《野草》仿作，分析其如何在戰鬥框架下生成，從中也論及與戰鬥化相伴相生的南洋視角與主題，亦即馬華族群的困境；其次，本文透過戰鬥哲學和語言形式的變化解釋仿作如何擺脫原作陰鬱的基調。

關鍵詞：魯迅、南洋魯迅、野草、馬華文學、仿寫

2020年9月5日收稿，2021年4月5日修訂完成，2022年1月22日通過刊登。

* 本文蒙黃錦樹教授、許德發教授、高嘉謙教授與方美富教授的評論與指點，謹此致謝。同時感謝兩名審查人的意見。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一、前 言

魯迅（1881-1936）是對馬華文藝界影響最大的中國現代作家，其影響在 1930 至 1970 年代尤其明顯。自 1936 年 10 月 19 日魯迅逝世之日起，馬華文藝界持續發起紀念活動，其中有周年祭、誕辰紀念會、座談會等，華文報刊雜誌也常於每年十月籌劃魯迅紀念特輯，類似傳統到 1970 年代中期才告結束。¹ 這段期間，馬華文藝界不斷發出「以魯迅為導師」、「作魯迅的子弟」等聲音。人們不只閱讀魯迅，也學習、模仿他的語言風格和雜文文體。作文學批評時，魯迅的思想與語錄常被引用，文章也被當作範本。² 魯迅在馬新的影響可見一斑，論者因此總結，「我們找不到第二個中國作家，在馬來亞享有像魯迅那樣崇高的威信」，³ 研究魯迅在馬新的影響自然有其必要。

本文嘗試以仿寫的進路切入「魯迅在馬新」的議題。仿寫的過程涉及對原作的理解、挪用與改造，背後往往也牽涉仿寫者的歷史情境與寫作訴求，從中觀察馬華作家與魯迅的關係既具體、細緻，也不失歷史宏觀視野。馬華作家的魯迅仿作以小說為主，目前也有相關研究面世。⁴ 有別於此，本文處理的是較為少見的對魯迅散文詩的仿寫：1950 年代，馬華作家雲里風⁵（1933-2018）書寫數篇《野草》的仿作，這些散文均收錄於《夢

1 章翰，〈魯迅對馬華文藝的影響〉，《魯迅與馬華新文藝》（新加坡：風華出版社，1977），頁 10-16；莊華興，〈六七十年代新馬華文雜誌中的魯迅〉，收入張鴻聲、朴宰雨編，《世界魯迅與魯迅世界——媒介翻譯與現代性書寫》（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4），頁 222。

2 王潤華，〈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華文後殖民文學：中國、東南亞的個案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頁 62-64。

3 章翰，〈魯迅對馬華文藝的影響〉，頁 7。

4 見王潤華，〈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南治國，〈旅行的阿 Q——新馬華文文學中的阿 Q 形象談〉，《華文文學》54(2003.11): 42-49；張松建，〈國民性、個人主義與社會性別——新馬華文作家對魯迅經典的重寫〉，《文心的異同：新馬華文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頁 3-53。

5 雲里風，原名陳春德，1933 年生於福建莆田，1948 年移居馬來半島，2018 年逝世。1950 年代，雲里風初入文壇，出版了五部短篇小說集、兩本散文集、兩本選集，同

嚙集》⁶中。《野草》是集中體現魯迅複雜思維、詩意和黑暗面⁷的散文集，這部代表魯迅文學性最高水平的作品到了馬新會有什麼際遇？又為何會出現這個變化？本文發現，身處英殖民時期的雲里風受現實主義和魯迅雜文風格所影響，他不但將《野草》戰鬥化，也一改《野草》的陰鬱基調，使作品明朗化，呈現一種雜文化的趨勢，變化之大，十分引人注目。晚近，隨著華語語系或華夷風研究的興起，文學的跨境之旅及特定時空下的文學變異在在受到關注。⁸南洋的《野草》仿作即演繹了跨時空的巨大轉變，其框架、主題、基調均被改頭換面，文體也從散文詩向雜文偏移，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個案。過去，關於《野草》的研究基本以經典解析為主，研究者分別從文學、哲學、歷史等路徑豐富詮釋，⁹至於《野草》的重寫和跨境之旅，過往研究者較少留意，本文因此試圖彌縫補缺。

本文的目的在於分析雲里風《野草》仿作的改寫¹⁰特色及背後的歷史

時在杏壇服務 30 多年。雲里風曾任五屆馬華作家協會會長，1995 年獲馬華文學獎，是馬華文壇的資深作家。

- 6 雲里風，《夢嚙集》（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1971）。
- 7 「黑暗面」指向魯迅作品常常流露的陰鬱基調與不安情緒，詳見夏濟安著，萬芷均等譯，〈魯迅作品的黑暗面〉，《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頁 129-143。
- 8 史書美曾指出華語語系研究的跨國和比較性。另，王德威強調「文學地理」和「國族想像」疆界的變動不居，並曾分析魯迅和張愛玲如何「南下」臺灣與南洋。見 Shu-mei Shih, "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n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ed. Shu-mei Shih, Chien-hsin Tsai, and Brian Bernar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25; 王德威，〈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臺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中國現代文學》22(2012.12): 8-35。
- 9 《野草》接受史、詮釋史的精簡梳理可參（美）羅福林（Charles A. Laughlin）著，孫靜譯，〈永久的對立：魯迅《野草》的接受史及其修正〉，《中國圖書評論》2015.4(2015.4): 77-92。
- 10 本文一般情況下以「仿寫」、「仿作」指稱雲里風的書寫和作品，除了參考作者的個人說法——「曾經不自量力，東施效顰，模仿《野草》的筆調，寫了幾篇隱喻性的散文」，也基於 1930 年代至 1970 年代馬華知識界對魯迅的崇拜事實。馬華知識人很長一段時間把魯迅視為「毛澤東之下，萬人之上」的文化偶像，對於偶像，他們不敢平等對話，更遑論突破、超越，用哈洛·卜倫（Harold Bloom）的說法即是，魯迅

意涵與文學訴求，從中勾勒馬華作家與魯迅的關係。《野草》的仿作過去有受到一些學者注意：古遠清曾點出雲里風散文的《野草》痕跡，並認為他並非單純襲用原作，而是「用自己的生活實踐去獲取新的感悟」，「加進南洋色彩」。然而，古氏僅約略分析原作與仿作的異同，沒有進一步解釋背後的原因。其次，對於文中的南洋色彩，也僅僅以出現「污染的河流」、「那亞塔屋旁邊的幾棵直而高的椰樹」簡單帶過。¹¹ 相比古遠清，張松建對兩部作品的異同有進一步分析，但對於相異之處，卻更多解釋成雲里風思想高度未及魯迅之故。¹² 韓曉芹則嘗試把仿作置於馬新歷史情境中分析，但僅以幾句點到為止，沒有結合文本作深入的闡釋。¹³ 有別於前人，本文將把雲里風的仿作置於馬華政治與文壇情境進行考察，透過更多歷史脈絡化的工作解釋文本的變異。本文將指出，雲里風的《野草》仿作反映殖民與冷戰時期的戰鬥印記，這點也是過往研究忽略的面向。雖然雲里風的仿作在藝術與思想上無甚可觀，但這種沒有超前、獨創表現的作品反而更能看到時代的痕跡，反映普遍的思想狀況，¹⁴ 也因此，對於這類作品，比起美學進路，歷史化會更適合的操作。

對馬華作家沒有造成「影響的焦慮」，只有「沒有焦慮的影響」，故帶有謙卑意味的「仿寫」一詞較適合指稱馬華作家的舉動。然而，在突顯仿作和原作的不同時，本文將採用「改寫」一詞。見雲里風，〈魯迅對新馬華人社會文化的影響〉，雪隆興安會館網站，2012.8.31，<http://shingansk1.org.my/html/archives/790.html>（2020.8.9 上網檢索）。

- 11 古遠清，〈魯迅精神在 20 世紀 50 年代的馬華文壇〉，《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7.5(2001.9): 58-59。
- 12 張松建，〈國民性、個人主義與社會性別——新馬華文作家對魯迅經典的重寫〉，頁 39-40。
- 13 韓曉芹，〈論馬華作家雲里風 1950 年代散文中的「魯迅筆法」〉，《玉溪師範學院學報》31.12(2015.12): 32。
- 14 此說啟發自黃進興對其博士論文研究對象李紱的判斷：「（李紱）是一個次要的思想家，因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個大時代的氣候。因為第一流的思想家、學者往往超越那個時代，走在前面，要談朱熹、王陽明反映了當時什麼，很難。但李紱更能反映當時學術的氣氛。」見黃進興，〈師門六年記：1977-1983〉，收入（美）田浩（Hoyt Tillman）編，《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 viii。

具體操作上，本文先簡述戰後至 1950 年代的殖民情境以及馬華知識人的魯迅接受，或本文所稱的「南洋魯迅」像。為了更完整地還原「南洋魯迅」像，本文除了援引過往研究，也會採用前人較忽略的原始材料，尤其是報刊雜誌。透過以上基礎，本文將對雲里風的《野草》仿作展開分析：首先突顯其中的戰鬥書寫，觀察雲里風如何將《野草》戰鬥化，從中也將論及與戰鬥化相伴相生的南洋視角；其次，透過戰鬥哲學和語言形式的變化，解釋《野草》如何擺脫陰鬱的基調，變得明朗化。

二、殖民情境下的「南洋魯迅」像

二戰後，英殖民政府與華人的關係愈加惡劣。1948 年 6 月，英殖民方與以華人為主的馬來亞共產黨正式決裂。馬共遭英方查禁，淪為非法組織，後轉入森林展開武裝鬥爭，英方也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覆巢之下無完卵，隨著馬共的節節敗退，其他左翼組織也被查封，左翼人士則遭拘捕、被令出境。1949 年起，幾乎每個月都有華僑被驅逐，直至 1960 年 12 月 30 日，仍有 150 人被下令出境。¹⁵ 針對華文學校，英方也出臺一系列教育法令以壓制之，如 1950 年《學校註冊法令》列明政府可隨時關閉學校，1951 年《巴恩教育報告書》主張取消方言學校（包括華校），代之以馬來文或英文為媒介語的國民學校。這種把多源流教育單源流化的手段意在隔絕中國共產黨對殖民地的影響和壓制當地的反殖民力量。¹⁶ 同時，英方還抄檢懷疑有共產黨入侵的華校，新加坡的華僑中學、南洋女中、育英中學，加影的華僑學校即是其中案例。¹⁷ 類似控制也延伸至左翼華文刊物，新聞檢查、書籍查禁等無時或已。自 1949 年至 1968 年間，共有 1024 本書被禁止，當中亦有不少人因禁書落網。除了武嚇，英方也採文攻策略，如以文化協會之名到各校派書，《共產主義運動簡史》、《中共的

15 莊華興，〈魯迅在冷戰前期的馬來亞與新加坡〉，《思想》39(2020.1): 202。

16 吳小保，〈冷戰與馬來亞左翼（反）國語運動〉，《東南亞學刊》13.1(2018.4): 51。

17 方美富，〈被禁止的知識：馬來亞緊急狀態下知識人對抄檢左派政策的回應〉，《中山人文學報》47(2019.7): 25；董總總務處，〈風雲激蕩一百八十年：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圖片集〉（加影：馬拉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2001），頁 8。

幹部教育》、《中共政權第五年》，《史達林罪行秘史》等香港出版的華文反共書籍因此進入學校。¹⁸ 須注意的是，以上舉動也是英方對美國冷戰策略的配合。1949年起，英方便開始與美方加緊對付在英屬馬來亞的左翼分子。同一年，美國派代表團到東南亞考察，並提供技術和經濟支援，且也出臺《美國對東南亞華僑政策的指導方針》，鼓吹中國威脅論，向東南亞華僑灌輸反共意識及隔離與中國大陸的聯繫。到了1957年，美國國務院又推出《對東南亞華人宣傳的指導方針》，鼓勵華僑融入東南亞社會。¹⁹

以上壓制與宣傳自然引來馬華知識人的不滿，而此時也是他們與魯迅相遇的時候。須了解的是，「南洋魯迅」像很大程度受中共和左翼文壇影響：1920年代，作為中國知名作家的魯迅在馬新的地位並不顯著；1930年，隨著創造社、太陽社對魯迅等五四文人的攻擊，《星洲日報》也出現批評魯迅不夠前衛的言論。然而，待魯迅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馬華知識人對魯迅的評價則改弦易調，開始稱他為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的重要作家，以及反資產階級的、左派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家。²⁰ 此論述轉變之所以出現，是因為發聲方多為左翼知識人。隨著1927年國民黨清黨、1937年中國抗戰爆發、1942年馬新被日本殖民，許多左翼知識人從中國南下，他們或避難，或宣傳，同時在南洋辦報辦學，左翼思潮及中國的魯迅論述因此極易嫁接來馬。戰後最初幾年魯迅的主要傳播者是南來宣傳抗日、反蔣的代表，如胡愈之、汪金丁、洪絲絲等人，他們是馬華知識界的重要組成，其影響甚至延續到1950年代北歸為止。²¹ 此外，1950年代討論並肯定魯迅的文人、知識者還包括林連玉、杏影、苗秀等人，他們的立場或左傾，或中立，並且不介入政治運動。總之，以上政治情境及主要的魯迅討論者之立場皆影響「南洋魯迅」的構成。

「南洋魯迅」像的特色首先表現在戰士身分的強調。馬華知識人稱他

18 以上討論見方美富，〈被禁止的知識：馬來亞緊急狀態下知識人對抄檢左派政策的回應〉：24、36。

19 莊華興，〈魯迅在冷戰前期的馬來亞與新加坡〉：203-204。

20 以上討論見章翰，〈魯迅對馬華文藝的影響（1930-1948）〉，頁2-3；王潤華，〈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頁53-55。

21 莊華興，〈魯迅在冷戰前期的馬來亞與新加坡〉：205。

為「文藝界的導師和戰士」²²、「荷戟沖鋒的勇士」。²³ 為了匹配此稱呼，他們將魯迅的一生詮釋為戰鬥的一生——「同盟會時代，他主張推翻滿清的專制政權。五四時代，他向舊禮教挑戰，拋出第一顆手榴彈——狂人日記——向人吃人的社會爆炸」、「始終沒有停息過投槍；始終趕在時代的前頭搏鬥」，²⁴ 仿佛除了戰鬥別無其他。許多知識人也總結魯迅的戰鬥態度，無獨有偶的是，他們都突出魯迅的「敢」——「敢言、敢怒、敢笑、敢哭、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這可詛咒的時代」，²⁵ 以及韌的戰鬥——「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²⁶ 馬華知識人也肯定魯迅以文學作戰鬥的良器：與魯迅同為左聯成員的南來左翼文人汪金丁即言，「（魯迅）先生的戰鬥的業績，卻是通過『文藝』方式而完成的」；²⁷ 有「海外的魯迅」之稱的新加坡報人、作家連士升亦道，魯迅「為著改造人民的思想，最厲害的武器莫如文藝」。²⁸ 現實主義作家杏影同樣肯定魯迅藉雜文罵人的舉動：「魯迅先生所罵的人，在當時的讀者看來，可能也覺得有時是罵錯了的。但在今天，歷史的事實，卻證明了很多被魯迅先生罵過的人，都是該罵的。」²⁹

從魯迅形象極高的同質性可知，這些記憶是在社會框架所提供的參考座標下運作，而非純粹個人心智作用或想象的產物。³⁰ 記憶研究（memory

22 秋風，〈魯迅不僅是文藝界的〉，《南僑日報》1947.10.15，第5版「文藝」。

23 江天，〈紀念魯迅有感〉，《魯迅讚》（吉隆坡：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中心，1991），頁105。

24 漠青，〈魯迅與青年〉，《風下周刊》97(1947.10): 193。

25 類似論述見春雷，〈學習魯迅韌的戰鬥〉，《南僑日報》1947.10.21，第5版「青年週刊」；丹影，〈倒下，又爬起！——魯迅先生逝世13周年紀念〉，《南僑日報》1949.10.21，第8版「南風」；林苗，〈魯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祭〉，《文藝行列》4(1950.10): 3；吐虹，〈想起魯迅的一句話〉，《南洋商報》1954.10.19，第12版「商餘」。

26 春雷，〈學習魯迅韌的戰鬥〉。

27 金丁，〈從紀念魯迅聯想起來〉，《南僑日報》1947.10.18，第5版「魯迅逝世紀念特輯」。

28 連士升，〈魯迅先生——人民世紀的舵工〉，《文藝行列》4(1950.10): 7。

29 杏影，〈補白雜記〉，《南洋商報》1954.10.19，第8版「文風」。

30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and ed.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studies) 強調，記憶框架往往由特定團體的社會價值系統、意識形態、原則等形塑而成，³¹ 既然討論魯迅的多為左翼人士或現實主義文人，其論述框架下的魯迅像自然會沾上相關色彩，亦即充滿戰鬥性。甚至，魯迅有時不只是單純的戰士，還是社會主義戰士。這個形象必須追溯到瞿秋白，他是將魯迅思想納入馬克思主義話語的重要代表。³² 1933 年他曾如此評述魯迅的思想：「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並且也強調魯迅「和農民群眾有比較鞏固的聯繫」，³³ 這樣的話語後經毛澤東〈論魯迅〉、〈新民主主義論〉的強化而成了鐵律。有了中共提供及「加持」的形象後，類似論調也出現於馬華文壇中。1950 年，左翼刊物《文藝行列》第 4 期的「魯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祭」專題中，馬華知識人或強調魯迅「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³⁴ 的名言，或封魯迅為「勞苦羣眾偉大的文化導師」，³⁵ 並且表示要模仿魯迅，「把我們的筆變成投鎗、坦克和炸彈，去為廣大的勞苦羣眾服務」。³⁶ 1950 年代，馬華文學史家方修也寫了一系列討論魯迅的文字，並收錄於《避席集》中，文中指出瞿秋白對魯迅的思想歸納是無可辯駁的定論。³⁷ 並且，方修公開支持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的魯迅論述——「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甚至嚴厲批評對魯迅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40. 戴麗娟，〈法國史家的記憶課題——近三十年的重要著作與討論〉，《思想史》3(2014.9): 196。

31 汪民安主編，《文化研究關鍵詞》（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13），頁 94。

32 錢理群，〈導讀：魯迅遠行以後……〉，收入魯迅著，何凝（瞿秋白）編，《魯迅雜感選集》（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1），頁 6。

33 何凝，〈魯迅雜感選集序言〉，收入魯迅著，何凝（瞿秋白）編，《魯迅雜感選集》，頁 101-102。

34 莫千山，〈魯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祭〉，《文藝行列》4(1950.10): 2。

35 何淀，〈魯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祭〉，《文藝行列》4(1950.10): 2。

36 同上註。

37 方修，〈魯迅的思想〉，《避席集》（新加坡：文藝出版社，1960），頁 82。

聖人之稱有所商榷的曹聚仁。³⁸最後，他還根據馮雪峰的回憶指出，魯迅「願意在一位年輕的政治家下面當小兵呢」。³⁹「南洋魯迅」像很大程度上和中共或毛澤東論述亦步亦趨，⁴⁰學界指出，毛澤東於延安時期前後的魯迅論述至少影響了中國建國後三十年內的魯學研究，⁴¹殊不知其論述也遠赴重洋，到了馬新，鼓舞了幾代知識人。

記憶畢竟是過去在當下的存在，它常因應當下的需求而被建構，⁴²在英殖民時期紀念戰士魯迅，實也是為了從魯迅身上汲取反帝反殖的資源。1947年10月19日，新加坡舉辦魯迅逝世十一周年紀念大會，曾在南洋創辦《風下周刊》和擔任《南僑日報》社長的胡愈之在會上指出：「魯迅不僅是中國翻身的導師，而在整個亞洲亦然，對民族問題（的主張）是一切平等，教人不要做奴隸。」⁴³魯迅的反奴役精神在此從中國擴展至亞洲，當中自然涵蓋胡氏腳下的英屬南洋。曾任《南僑日報》文藝編輯的桃木則把抗日戰爭的勝利歸功於魯迅：「魯迅精神的路牌，隨時地在指示著路程的方向，羣眾循著指示的方向前進，不怕荊棘，不怕虎狼，在萬眾一心之下，經了八年的時間，法西斯惡魔終於倒下去了！」⁴⁴八年抗戰始於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件，而魯迅在1936年10月19日即已去世，然桃木仍認為魯迅貢獻良多，其精神是抗日戰役的重要支柱。也有知識人如此說道：「在這『方生未死』之間的年代，在這苦難重重的年代」，對

38 方修，〈魯迅為什麼被稱為聖人？〉，《避席集》，頁77-81。

39 方修，〈魯迅的文藝觀〉，《避席集》，頁91。

40 有人甚至根本沒有讀過魯迅著作，只是人云亦云。曾在1977年出版《魯迅與馬華新文藝》的韓山元在一次訪談指出：「我們那時主辦紀念魯迅的活動上，那時參加的人沒有幾個人看過魯迅的作品。因為魯迅的一些雜文是他們看不懂的。因此舉魯迅旗子的人多數都是沒有看魯迅的書。這是因為羣眾運動有一個特點，就是順大流。很多人是『羊群心理』。」見鄭翊涵，〈附錄：韓山元的回憶錄〉，收入鄭翊涵，「魯迅對新馬華人社會的影響——二戰後至文革時期」（新加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本科論文，2014），頁34。

41 李松，〈毛澤東的魯迅論〉，《中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5.4(2009.8): 559。

42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39-40.

43 引自章翰，〈魯迅對馬華文藝的影響（1930-1948）〉，頁15。

44 桃木，〈應怎樣紀念魯迅先生〉，《南僑日報》1947.10.1，第5版「文藝」。

魯迅的「悼念越沉痛，崇拜越堅貞」。⁴⁵ 在殖民地書寫這些話，說明魯迅精神扮演了激勵和引路作用，如莊華興所言，魯迅讓人們意識到，環境並不構成阻礙因素，個人具有突破囹圄的可能。⁴⁶

結合上文分析，可以總結，「南洋魯迅」圖像呈強烈的黨派性和政治性，它除了受中共影響，亦劍指冷戰時代的殖民者。實則，無論在馬新，還是在中國，甚至東亞，魯迅都發揮了戰鬥、反殖民作用。⁴⁷ 甚至，就本文分析的時間範疇而言，「南洋魯迅」像還比中國激進。延安整風運動後，毛澤東已大權在握並樹立權威，不再如 1930 年代般須藉助魯迅對中國民眾，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影響。自 1942 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中共便開始留意魯迅的消極影響。關於魯迅的雜文，〈講話〉如此說道：「如果不是對於人民的敵人，而是對於人民自己，那末，『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曾嘲笑和攻擊過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筆法也和對於敵人的完全兩樣。……如果用對付敵人時所需要的刻毒手法來對付同志，就是把自己站到敵人的立場上去了。」⁴⁸ 也就是說，魯迅的批判因人因時而不同，對於「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以及他們建立統治秩序的時代，它就「此路不通」，堅持魯迅式批判的反成敵對勢力。如此擔憂當然有其根據，因魯迅對中共而言實是一把雙刃劍，一開始中共確靠魯迅吸引不少知識分子到延安，但當中也有人（如王實味）以他為榜樣，不斷批判現實、對社會現狀永遠不滿，⁴⁹ 因而戳中中共神經。回觀馬新，馬華知識界持續承受政治壓力，反殖民事業一直磕磕絆絆，情況與新中國不可同日而語。何況，馬華社會難以誕生毛澤東、魯迅式的政治或民族英雄，也沒有能力產生自己的思想家。它畢竟是移民社會，且其遷移是個人性的而非整體性的移植，這種社會階層（沒有嚴格意義的「士」

45 潔石，〈魯迅之路〉，《南僑日報》1947.10.15，第 5 版「文藝」；魂，〈向東南亞兄弟民族文化學習：紀念魯迅先生〉，《星洲日報》1955.10.19，第 4 版「青年園地」。

46 莊華興，〈魯迅在冷戰前期的馬來亞與新加坡〉，頁 207。

47 關於「南洋魯迅」和「東亞魯迅」的進一步比較見張康文，〈「馬華魯迅」與「東亞魯迅」：對話的可能與不可能〉，《思想》39(2020.1): 193-196。

48 毛澤東，〈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延安：解放社，1949），頁 39。

49 見錢理群，〈導讀：魯迅遠行以後……〉，頁 33-39。

階層)、文化基礎及體制(教育體系與文化傳統)的不完善自然導致文化的破碎化、淺層化,即便到了1950年代,馬華整體的、完整的社會形成(性別平衡、社會及治理結構的完備、文化再生產機制等)也並未算得上完備。⁵⁰ 在這種處於同一年代卻有條件差距的情況下,中國已開始防範魯迅,馬新則持續抬出魯迅,高歌其戰鬥與反殖民意義。如同《文藝行列》〈編後話〉所言:

當黑夜過去,太陽出來的時候,滔滔的長江也流來了四萬萬七千萬人民的歡呼,因為新的日子已經開始了,魯迅先生當年播下的種子已經開花而且結出燦爛的果實。可是在今日的海外,我們還得用沉重的心情來紀念他,學習他!⁵¹

對編者而言,成功解放的中國應享受魯迅播下的果實,仍在反殖民的馬新則須繼續紀念、學習魯迅。1954年,現實主義作家苗秀也在〈講話〉的前提下提出,馬華文藝「還是雜文時代」,⁵² 還須寫魯迅式的戰鬥性雜文。一言以蔽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魯迅」。

三、《野草》仿作的戰鬥性與華族認同

在反殖浪潮席捲馬新的1950年代,馬華知識人基本從戰鬥的框架與魯迅相遇,於殖民期間書寫《野草》仿作的雲里風也可看到這方面的印記。他曾如此回憶1950年代的魯迅崇拜現象:

我們不但把魯迅當做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也把他視為青年導師,更把他當做是一位敢於反抗舊社會不合理制度的勇猛鬥士,……在50年代初期,新、馬都還是英國的殖民地,一般華人傳承著封建的遺毒,

50 許德發,〈文學如何「現實」?——馬華文學現實主義中的政治介面(1919-1930)〉,《中國現代文學》28(2015.12): 81。

51 編者,〈編後話〉,《文藝行列》4(1950.10): 10。

52 苗秀,〈這還是雜文時代〉,《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第一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頁67-68。

過著頹喪萎靡的生活，文教界的有識之士，受著魯迅思想的影響，積極展開反封建、反殖民地與反黃色文化的運動。⁵³

雲里風的觀點不出一般馬華知識人的視界，同樣視魯迅為反殖鬥士。縱觀雲里風一生的作品，他其實不能歸類為左翼作家，而是現實主義作家。然，1950 年代初入文壇時，他顯然受到左翼風潮和個人的浪漫情懷所影響，常有意無意將戰鬥性（甚至紅潮印記）融入文中。其曾被禁止入口新加坡的處女作《黑色的牢門》⁵⁴ 所收錄的小說〈槓頭〉（1953/1954）除了批評社會與文化問題，也敘及年輕男女的讀書會，其閱讀書目除了左翼文學經典《子夜》，還有「紅皮的」《魯迅全集》。⁵⁵ 〈後記〉中，他意有所指地提到：「我大胆的選出了二篇散文（包括下文將分析的〈文明人和瘋子〉），當做這本集子的序文，我想讀者們不難從中領略一些情趣」。⁵⁶ 這個情趣為何？用雲里風自己的話說，即是「衝刺性」。1981 年回顧自己的《夢囈集》時，他感歎自己「再也寫不出年青時代的那種衝刺性的作品了」。⁵⁷ 這個衝刺性或戰鬥性基本可見於以下幾點：

首先，仿作頻頻搬演典型人物的對立與衝突。仿寫〈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文明人和瘋子〉（1955）中，文明人身著西服，瘋子則一絲不掛，儼然是「高等華人」或資產階級和平／貧民代表或無產階級。對於

53 雲里風，〈魯迅對新馬華人社會文化的影響〉。

54 《黑色的牢門》被禁止入口的其中一個理由或許和它是香港文匯出版社的出版物有關。此出版社應屬於香港《文匯報》，此報原為上海報紙，1948 年 9 月 9 日於香港復刊，當時督印人徐鑄是中共地下黨員，因此《文匯報》自然由左翼掌控。1949 年後，《文匯報》是香港左翼文學的主要陣地之一，經常刊登中國名家和香港左派作家的作品。見趙稀方，《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香港：三聯書店，2019），頁 214、356。

55 雲裏風，〈槓頭〉，《黑色的牢門》（香港：文匯出版社，1957），頁 27。雲里風在《黑色的牢門》以「雲『裏』風」為筆名，《衝出雲圍的月亮》、《夢囈集》開始改為「雲『里』風」，故本文唯在引用《黑色的牢門》時採用「雲裏風」。

56 雲裏風，〈後記〉，《黑色的牢門》，頁 146。

57 雲里風，〈生活經驗與靈感〉，《文藝瑣談》（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1991），頁 50。

瘋子，文明人頻頻審視、嘲笑，甚至要改造對方，以成為他們的一員。仿寫〈過客〉的〈狂奔〉（1955）同樣形塑「我」與老者這兩個分別代表進步分子與落伍者的角色，前者如原作的過客般一路狂奔，後者則倚老賣老，既警告前方危險又以身擋人。情節上，仿作基本走向進步者對落伍者的拋棄、打倒：〈文明人和瘋子〉中，文明人有意同化瘋子，但瘋子不為所動，最終選擇拋棄「文明」隊伍；〈狂奔〉中，一心只想前進的「我」面對頑固不靈的老者，只好把他推入河中，與原作的告別、祝福老翁有絕大的不同。貧／富、進步／落後、資本家／勞動者的對立以及前後者的道德差距亦可見於《夢囈集》其他散文中，如〈夢與現實〉、〈西升的太陽〉、〈昨夜的夢〉。⁵⁸ 同樣收於集子的文學評論〈漫評「天仙配」〉也採用典型人物論及階級鬥話語，他對整部作品的總結是「歌頌封建社會下的女子追求愛情的勇氣及窮苦勞動人民善良純真的優秀本質，並攻擊地主階級即統治者的殘暴陰險與自私」，文中甚至批評「中國數千年來農村經濟的崩壞，地主的操控與剝削是個主因」。⁵⁹ 由此可見，受社會氛圍的影響，青年雲里風此時對左翼思潮有了朦朧的認識。這種對身分、立場、階級的敏感實是戰後至 1950 年代馬華文壇的現象之一，⁶⁰ 再看雲里風收於《夢囈集》的雜文〈慶祝一座精神堡壘的築成〉（1954）：

我們深深的體會到團結就是力量這句話，所以我們要堅強的團結起來，拿起我們的利器，盡我們最大的力量，來剷除文藝路上一切有害於我們前進的障礙物，……我們撲倒下去之後，還有更多勇敢的未來的我們，緊接著下去呢！⁶¹

58 分別見雲里風，《夢囈集》，頁 1-6、17-20、29-31。

59 雲里風，〈漫談「天仙配」〉，《夢囈集》，頁 92、88。

60 當時的文藝批評極易見到反奴役、反壓迫的立場和階級話語，如趙戒〈現階段的新民主主義文學論〉主張當時應有反奴役反壓迫的「新民主主義文學」；夏霖〈論文藝的戰鬥性與建設性〉強調要配合弱小民族解放鬥爭而展開戰鬥性的馬華文藝；白寒〈略談馬華文藝〉提醒文藝應以勞動人民為對象，反映其感、思想、要求。以上文章分別見於苗秀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第一集）》，頁 29、43、57-59。

61 雲里風，〈慶祝一座精神堡壘的築成〉，《夢囈集》，頁 101-102。

文中不僅標舉前進與保守之間的敵我二分，也以檄文式、毛式的語句、語氣表達堅決態度，這種立場對立與戰鬥性同樣展演於〈狂奔〉中的人物設置與暴力情節中。

接著，就像上引雜文中的「團結就是力量」，雲里風確也在仿作中表現對群體，特別是青年群體的重視，這點尤其表現在〈狂奔〉中。〈過客〉中，過客形單影隻，孤獨前進，類似身影也可見於〈影的告別〉那自我放逐於黑暗的影子中，以及〈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的「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⁶²的意象中。然而，〈狂奔〉中，前進的路上除了「我」自己，還有一個由年輕人和小孩子組成的隊伍。文中從「我」的視角出發，不時對這年輕隊伍投以讚歎——「他們的隊伍竟像是一支生力軍，跑得飛般的快」、「赤著上身，穿著短褲，踏著鐵靴，多雄偉的氣魄呀」、「我像達到了理想中的勇士」、「好像永遠不會疲倦似的」。⁶³此外，「我」也不停自我反思、審視，彷彿進行思想鬥爭和改造——「要是被他們趕上去，那麼我將要變成落伍者了」、「我終於和他們結成一夥兒，繼續的往前跑，一直的跑了不少的路程」。⁶⁴丸尾常喜在分析〈過客〉時指出，老翁與女孩分別是「絕望」和「希望」的象徵，⁶⁵前者灰心、麻木，相信路的前方是「墳」，後者樂觀、天真，看到前方「有許多野百合，野薔薇」。⁶⁶借用此說法，可以發現，〈狂奔〉表面上只有過客和老翁的化身（「我」和老者），女孩彷彿消失不見，實則這代表「希望」的女孩已化為前述的年輕生力軍，成為「我」的榜樣。文中那衣服簡便、活力充沛、青春逼人的隊伍所指何人，前人研究未有注意和解釋。實則，他們即是當時的馬華文壇常歌頌的青年群體。⁶⁷新文學運動時期，中國文壇已有描寫平／貧民的呼聲，胡適即

62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卷 1〈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頁 145。

63 雲里風，〈狂奔〉，頁 13。

64 同上註。

65 （日）丸尾常喜著，秦弓、孫麗華編譯，《恥辱與恢復——《吶喊》與《野草》》（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237。

66 魯迅，《魯迅全集》，卷 2〈過客〉，頁 195。

67 《夢囈集》收錄的〈囃語〉也刻畫一群孩子圍繞著一個教育工作者聽道，四邊各站著

曾呼籲書寫「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⁶⁸但這裡的關懷重心是「個人」，雲里風這種對青年「群體」的歌頌則比較是受到左翼思潮的「文藝為工農兵」說的影響，亦即將文藝從屬於政治，為無產階級服務。馬華左翼文藝評論家謝白寒就強調，文藝應以勞動人民為中心，反映他們的感情、思想、要求；⁶⁹苗秀雖非左翼作家，但也強調不可「脫離羣眾」，要描寫「平凡人生」。⁷⁰戰後的馬華文學確常表達對工友與農民的關心與頌讚。⁷¹而且，上一節的「南洋魯迅」像中，我們也常見到魯迅與「勞動羣眾」、「無產者」的親近，這似乎已成共識。受時代風潮與上述魯迅論所影響，雲里風的《野草》仿作也出現從孤獨前進向群體行動的轉變。

此外，《野草》仿作還以個別意象召喚左翼記憶。關於這點，〈文明人和瘋子〉中的草鞋是個有趣的意象。前文提及，「脫光了衣服，一絲不掛」的瘋子應是平／貧民乃至無產階級的代表，裸身向人的他終於有了要求：「我的腳底已經脫皮、起泡，非常之痛了。我很想找一雙草鞋子，因為我知道我還得走非常遠的路。」⁷²須注意的是，此文寫於1955年，當時的馬新並不流行草鞋，從《南洋商報》、《星洲日報》的新聞與廣告可知，自1920年代，橡膠鞋就已非常普遍且廉宜，1950年代甚至出現廉價膠鞋過於風行以致補鞋工人失業的窘境。⁷³因此，仿作特別標舉「草鞋」可能別有所指。回看瘋子的角色定位再參照中國左翼話語，可知「草鞋」召喚的也許是毛澤東或左翼的相關記憶。毛澤東與草鞋的傳說數不勝數，其中不外有毛澤東穿草鞋以親近底層，或有兵士背著毛澤東並將其草鞋倒過

象徵惡勢力的武夫，故事的最後同樣藉由孩子們的團結驅趕那四名反派。見雲里風，〈囃語〉，《夢囈集》，頁21-24。

68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4.4(1918.4): 18。

69 白寒，〈略談馬華文藝〉，頁57。

70 苗秀，〈馬華作家應多寫「平凡人生」〉，《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第一集）》，頁66。

71 謝詩堅，《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1976）》（檳城：韓江學院，2009），頁151、160、162、176。

72 雲里風，〈文明人和瘋子〉，頁10。

73 佚名，〈日本香港廉價鞋輸入影響下苦了補鞋工友〉，《星洲日報》1959.10.23，第8版「本地新聞」。

來穿上，成功避開國民黨圍剿云云。⁷⁴除了傳說，草鞋也因便宜、易補的特色而成了個別紅軍征戰的必需品。⁷⁵類似的左翼常見意象也不時閃現於《夢囈集》中，另一篇散文〈西升的太陽〉（1955）就描繪了一顆西升且冰冷、慘白的「贗品」太陽，以和東升的、「紅光四射」的、代表真理的「正品」太陽⁷⁶作對比，後者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東方紅」⁷⁷的意象——前引《文藝行列》的編後話的「當黑夜過去，太陽出來的時候，滔滔的長江也流來了四萬萬七千萬人民的歡呼，因為新的日子已經開始了」就以太陽象徵毛澤東或中共的崛起。如前所示，雲里風並非左翼作家，不過初入文壇的他確有親左痕跡。當然，這些意象、痕跡也可能是風起雲湧的時代與集體話語衝擊下不自覺的表現，而這種反映往往更能顯現時代的氣候。

最後，仿作也表現反帝國、反殖民主義的內容，從中也出現南洋化的特色。誠如黃錦樹所言，馬華文學深受社會寫實主義框架影響，常以時空座標的確指性（此時—此地性）為其存有論依據——一方面書寫主體的意識被所在時空所決定，一方面書寫者以文字為媒介介入、反映當下歷史—社會現實。⁷⁸〈文明人和瘋子〉中，雲里風對文明人的刻畫既指向殖民者，⁷⁹也指向華族內部的崇洋者，兩者皆是當時的重要現實。崇洋向是馬

74 佚名，〈毛澤東逆境中不忘群眾路線〉，《中國組織人事報》2013.12.6，第7版「史事通鑑」；劉永良，〈陳添裕反穿草鞋 毛澤東有驚無險〉，《中國老區建設》2016.5（2016.5）：57-58。

75 余璋，〈老紅軍王定烈：九死一生的草鞋將軍〉，《黨史縱覽》2016.2（2016.2）：11。

76 紅日意象也出現於《夢囈集》收錄的〈囈語〉中，見雲里風，〈囈語〉，《夢囈集》，頁24。

77 1940年代延安地區傳唱的〈東方紅〉開頭就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東方紅」、「太陽」自此常用以代表毛澤東。

78 黃錦樹，〈反思「南洋論述」——華馬文學、復系統與人類學視域〉，《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15），頁62。

79 此外，雲里風還曾以雜文加入反黃色文化的運動行列，〈拿起我們的棍子〉就是應鐘靈中學學報編者之邀而作。反黃運動肇因於一名叫莊玉珍的女子之奸殺案。當時華社認為此案的發生是黃色文化泛濫所致，這又牽涉1948年殖民地政府實行的緊急狀態，因緊急狀態為文藝設下諸多限制，不少刊物被禁止出版，黃色刊物反而在市場流通無阻。反黃和反殖因此是一體兩面，互為表裡。見雲里風，《夢囈集》，頁93-97、98-103。

華文壇批判的形象，背後除了有民族遭到背叛的憤怒，也投射作家對英殖民者的不滿。以西化得最為極致的峇峇華人為例，在英殖民時期，他們順應英方政策與教育體制，成功進入殖民地文官體制、成為現代專業人士，在政治和商業上分享殖民果實。當大量新客華人自十九世紀南來，並且將語言文字建構成華人身分認同的絕對標準後，峇峇華人很自然被汙名化為不會說華語或失根的華人。⁸⁰ 胡愈之曾於《風下周刊》寫過〈假如魯迅來南洋〉，文中除了將中國與南洋的殖民情境相提並論，也提及「魯迅著作中所描繪的高等華人，洋奴，順民，幫閑文人，也就是我們在海外到處可以接觸到的人物」，並且，「這裡的阿 Q，早已沒有一條黃辮子，而穿起洋鬼子的裝束」。⁸¹ 可見，在南洋援引魯迅時，洋奴是首先被批鬥的角色。回到〈文明人和瘋子〉，以西服、西方文明為尚的文明人同樣也在雲里風的批判之列。作為洋奴，文明人對應的是〈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奴才角色，惟魯迅筆下的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訴苦」，⁸² 要求的是心理上的安慰，⁸³ 雲里風筆下的文明人則變本加厲，他滿足於位階高下、優劣的差序，並以之向瘋子投以鄙夷的眼光。由此觀之，文明人也是聰明人⁸⁴ 的南洋子孫。對於文明人，雲里風以巧妙的形象與情節設計表達批判：他先從瘋子——瘋子在此也是對照於洋奴的新客華人——的角度反觀文明人，發現他們身上的西服並「不合式」，接著，當文明人要閃躲瘋子時，「一個戴高帽子的人帽子不幸掉了」，結果「一個癩痢頭」展露出來，另一個「穿名貴衣

80 黃錦樹，〈土與牆——論馬華文學本土論的限度〉，《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頁 247；Chee-Beng Tan,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Penerbit Fajar Bakti Sdn. Bhd., 1993), 26-29.

81 胡愈之，〈假如魯迅來南洋〉，《風下周刊》97(1947.10): 111。

82 魯迅，《魯迅全集》，卷 2〈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頁 221。

83 奴才曾言及，「我對先生訴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經舒坦得不少了。可見天理沒有滅絕……」奴才顯然只為訴苦，無意改變或推翻制度。當傻子打破其住處時，奴才也馬上趕跑傻子，並向主人邀功。同前註，頁 221-222。

84 馮雪峰曾評論：「『聰明人』其實也是一種奴才，不過是高等的奴才；他很聰明，知道迎合世故和社會的落後性，以局外人或『主子』的鄰居的姿態替『主子』宣傳奴才主義哲學，所以也是一種做得很漂亮的走狗。」見馮雪峰，《馮雪峰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卷 4〈論《野草》〉，頁 188。

服的人衣服破了」，結果讓人看到「背上正有一個大瘡疤」，⁸⁵ 這些與瘋子的身體特徵完全一樣。從中表明，文明人和瘋子並無二致，根本就是瘋子的一員，惟他們用打扮掩蓋了，當中不無諷刺以西化擺脫華人身分的作風。

文末，雲里風還以「文明化」的情節將批評升級：與魯迅原作不同的是，瘋子沒如傻子那樣被趕走，而是被一群代表文明人的猛漢擒住，以「禮貌」之名將他「文明化」——給瘋子穿上西裝、皮鞋，還打了領帶，戴上帽子及配上手杖，從中表露「西方 = 文明」的時人心態。值得注意的是，猛漢下手的當下正是瘋子尋找草鞋之時。這樣的情節不免讓人聯想到冷戰期間美國眼見東南亞華社的赤化而頻頻宣傳以「自由世界」和臺灣國民黨政權。⁸⁶「文明化」後的瘋子深受恭維，然而，瘋子對這身裝扮始終感到不自然——「帽子沉重的壓在我的頭上，像塊大石頭；衣服不但累贅，而且還摩擦得我身上的傷痕隱隱作痛；領帶不知怎樣竟越束越緊，幾乎讓我無法透氣；而腳上的皮鞋，更沉甸甸的使我無法起步」，⁸⁷ 最終卸下一切離去。這個情節或有兩個意義：一，再次突顯瘋子或華族與西服的「不合式」，暗示西風儘管吹進馬華社會，終究是外來文化，與己不合；二，藉由身體的不適指涉英殖民者對馬新華人的威脅與壓制。關於此，可參考雲里風於 1950 年代的創作遭遇：

我曾經多次被政治部召去問話，獲得嚴重的警告，叫我最好安分守己做一名教師，不要與左派青年交往，更不要在左派的文藝刊物發表作品。1957 年，我的處女作《黑色的牢門》由香港運往新加坡的 1000 本被禁止入口。1958 年我的第二部小說集《出路》由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後，雖然沒有被禁，但卻同樣惹上了不少麻煩。⁸⁸

可見，上文提及的政治壓力即發生於雲里風身上，對於英殖民政府及冷戰的壓制，他可謂深有體會。雲里風會將〈文明人和瘋子〉作為小說集的代序，想來它多少含有自我和現實的投射。

85 雲里風，〈文明人和瘋子〉，頁 9。

86 莊華興，〈魯迅在冷戰前期的馬來亞與新加坡〉：203。

87 雲里風，〈文明人和瘋子〉，頁 11。

88 雲里風，〈魯迅對新馬華人社會文化的影響〉。

〈聰明人和瘋子和奴才〉筆下的三個角色分別對應於社會的不同群體，但到了〈文明人和瘋子〉，其人物根本只有一個，也就是象徵華族身分的瘋子——只是路線不同，一個崇洋，一個堅持華族認同——雲里風對華族困境的在意可見一斑。這樣的主題和關懷有其歷史語境：英殖民時期，華族遭受的打擊日出不窮，除了前述的查封報刊、解散組織、拘捕左翼人士、包抄華校，英方還推出不利於華人平等權利的「馬來亞聯邦」（the Federation of Malaya）憲政，漸漸把政治權力交給馬來民族主義政黨巫人統一機構（巫統）為首的政治聯盟陣線（聯盟）。華文刊物方面，無論是否表現共產主義，只要是中國大陸特定出版社的刊物，一律禁銷，英方與後來的聯盟政府甚至有一種「讀華文刊物的都是共產黨」的刻板印象。⁸⁹ 在這種政權、文化皆受對付的局面下，華族危機感於焉誕生，並進入作家的視野。與〈文明人和瘋子〉相隔一年創作的小說〈火炬運動〉（1955）也可見到同樣的關懷，文中以馬來亞獨立前的華校危機為主題，表達華族對母語教育及族群文化的認同，當中也不時質疑華社的洋化現象。⁹⁰ 晚近，莊華興重探魯迅在馬新的影響，他不滿於前人僅從反殖民和社會主義角度解析，強調魯迅還塑造了華族的民族主義情結，以對抗冷戰期間英美切斷華人移民與祖源國聯繫之舉。⁹¹ 〈文明和瘋子〉和〈火炬運動〉的例子剛好可以補充印證，文中，批判西化和同情華族，反殖民和民族情結塑造確是交織在一起的。

四、《野草》仿作的明朗基調

在戰鬥框架的操作下，雲里風的仿作也出現基調上的轉變。如過往研究所言，它呈現了明朗、樂觀、自信的氣息，一改原作沉重的陰鬱色調，⁹²

89 當時，《資本論》中英版還出現截然不同的命運：英文版可公開兜售，中文版則難見於世。以上關於華文刊物的討論見方美富，〈被禁止的知識：馬來亞緊急狀態下知識人對抄檢左派政策的回應〉：35。

90 關於〈火炬運動〉的分析，可參莊華興，〈魯迅在冷戰前期的馬來亞與新加坡〉：210-211。

91 莊華興，〈魯迅在冷戰前期的馬來亞與新加坡〉：205-206。

92 張松建，〈國民性、個人主義與社會性別——新馬華文作家對魯迅經典的重寫〉，頁38。

可惜前人並未探究此基調具體如何形成。這種明朗轉向實可從戰鬥哲學和語言形式的變化找到軌跡：

（一）從絕望中的反抗到希望的召喚

戰鬥哲學上，《野草》仿作明顯體現「絕望的反抗」向「希望的召喚」的轉變。這點可見於仿寫〈過客〉及〈影的告別〉的〈狂奔〉和〈未央草〉（1954）。

〈過客〉中，過客所走的是「似路非路的痕跡」，⁹³ 暗示前方是一條毫無保障的路，能不能成路，取決於是否堅持不懈地走下去，如同魯迅在〈故鄉〉所言的「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⁹⁴ 接著，過客明確提到即將前往的「地方有許多許多野百合，野薔薇，我也常常去玩過，去看過的。但是，那是墳。」⁹⁵ 從中說明，過客有清醒的認識，知道前方未必只有樂土，還有墳在等候。可貴的是，明知死路在前，過客依然邁步走去，彰顯了「反抗絕望」的精神——魯迅在給趙其文的書信就表明，「《過客》的意思不過如來信所說那樣，即是雖然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絕望，因為我以為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鬥者更勇猛，更悲壯。」⁹⁶ 同樣的，〈影的告別〉一開始即以「有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裡，我不願去；有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裡，我不願去」⁹⁷ 表現對「天堂」、「地獄」等虛幻所在的否定。它也與〈過客〉一樣對未來不抱期待，文中的「有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裡，我不願去」⁹⁸ 就顯示了這點。對魯迅而言，未來或理想不切實際，只能麻醉、撫慰人心。⁹⁹ 既然如此，影子只能「彷徨於

93 魯迅，〈過客〉，頁 192。

94 魯迅，《魯迅全集》，卷 1 〈故鄉〉，頁 510。

95 魯迅，〈過客〉，頁 195。

96 魯迅，《魯迅全集》，卷 11 〈250411 致趙其文〉，頁 477-478。

97 同上註，卷 2 〈影的告別〉，頁 169。

98 同上註。

99 孫玉石，《現實的與哲學的：魯迅《野草》重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 29-30。

無地」，「被黑暗沉沒」，¹⁰⁰ 意即直面悖謬世界，¹⁰¹ 向虛空投以投槍，同樣展現「反抗絕望」的精神。魯迅曾言，「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只覺得『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¹⁰² 〈影的告別〉就展現了黑暗與虛無的實有，以及活於其中、與之相處的決心。

然而，以上對未來、理想的懷疑，以及對黑暗、虛無的直面卻在仿作中失蹤。先看〈狂奔〉，文中的過客「我」同樣是倔強的：「我」夢見自己在一條陰暗且充滿荊棘的漫長道路上奔馳，途中盡是犧牲者而「我」也已受傷，但仍不停地前進。然而，原作與仿作前進的動力大有不同：魯迅筆下的過客知道前方是墳，但仍繼續奔跑；〈狂奔〉則沒有原作的明知不可而為之，「我」之所以奔跑，是因為「知道前面的路會更平坦、更寬闊」，而且「在遠遠的前路，有一種美妙而嘹亮的聲音，在呼喚著我」。文末也進一步刻畫前方的風景：

我們正嚮往於那座高山，在那高高的山頂，有清新的空氣，有甘泉、鳥鳴、花香，那是多麼幽美的一個世界呀！你看，我們這裏正可以嗅到由那邊播出的芬芳，我們將登到極嶺，然後在那裏建起房屋，開墾耕種，過著自由美滿的生活，同時我們要號召更多的人，也來跟我們生活在一起。¹⁰³

這種仿如桃花源的景色顯示「我」對美好未來的期待與深信不疑。又，行動上，原作曾藉由過客的徘徊於休息與上路、沉思與驚起，展現希望與絕望之間的衝突與矛盾，但這些均消失於仿作中，「我」對於前進沒有任何猶豫、彷徨，僅僅擔憂落於人後。總之，〈過客〉不確定希望之所在，〈狂奔〉卻相信希望在前方等候；〈過客〉是為了反抗絕望而走，〈狂奔〉卻是為了希望而走。至於〈未央草〉，雲里風一改原作的「影」的自白體，

100 魯迅，〈影的告別〉，頁 170。

101 (日) 丸尾常喜著，秦弓、孫麗華編譯，《恥辱與恢復——《吶喊》與《野草》》，頁 155-156。

102 魯迅，《魯迅全集》，卷 11 〈250323 致許廣平〉，頁 467-468。

103 雲里風，〈狂奔〉，《夢囈集》，頁 11、12、15。

以原作中未發言的形體「我」為發聲者，表明自己與影子的良好關係。他隨處攜帶影子，並且到處向人誇耀：有了影子既能填補「心靈上的空虛」，又能有「無比的侷傲」。¹⁰⁴在此，影子成了理念的象徵。並且，「我」也表明要活在光亮之中，如此影子才能存在，至於黑暗，則必欲去之而後快，因為「影子是不能在黑暗中存在的」，¹⁰⁵「出沒在黑暗地方的」為鬼，而鬼「是沒有影子的」，「不是我的同類」。¹⁰⁶甚至，影子直接就是光亮的來源——「看到了我的影子安然地出現在我的身旁時，我的心靈之燈立刻隨之燃亮起來」。¹⁰⁷我們可如此概括雲里風的意思：只要有理念，便可活得充實、活出意義；而理念產於光明之中，本身也是光明之源，從中突顯了理念和希望的共生關係，背後道理竟近於原作所排斥的人世「天堂」或「未來的黃金世界」的保證。

仿作為何要置換前進的動機？又為何如此強調理念的重要？實則，這種深信理念，並且寄托於未來的想法，與馬華政壇與文壇的時代風氣有關。魯虎對 1949 年至 1965 年間馬新華人的中國觀之研究顯示，左翼組織希望馬新最終能發生像中國的政治變革，如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馬共或左翼的集中地甚至被命名為「小延安」——或至少實行更多的社會主義性質改革。¹⁰⁸雲里風並非左翼作家，然而渴望不再有壓迫和歧視的理想普遍存在於馬華作家心中，他們也為此寫下暗含反殖民思想、呼喚獨立自由的篇章，其中包括青年學生的理想與言行、新村居民的生活、緊急法令下的白色歲月、職工運動等。並且，他們對馬來亞的未來抱有積極、樂觀的態度，堅信未來會更好。¹⁰⁹前引雜文中，雲里風就曾表達其文化理想：「為了自己，也為了更多未來文藝路上的朋友，我們要出盡最大

104 雲里風，〈未央草〉，《夢囈集》，頁 32。

105 同上註，頁 35。

106 同上註，頁 32。

107 同上註，頁 35。

108 魯虎，《新馬華人的中國觀之研究：1949-1965》（新加坡：新躍大學新躍中華學術中心、八方文藝創作室，2014），頁 108、161。

109 相關文學特色見方修，《戰後馬華文學史初稿》（新加坡：T.K. Goh, 1978），第 8 章至第 10 章。

的熱與力，來開闢一條坦平而光明的文藝道路。」¹¹⁰ 另一篇雜文〈拿起我們的棍子〉（1954）也視文藝為改變世界的武器，先是對歌臺、電影和文藝加以檢視、批判，接著號召「用熱烈的心築成堅固的精神堡壘，用我們的筆做利器，刻畫出社會的黑暗，發出正義的呼聲」。¹¹¹ 這種對文藝理念的堅持，對未來的期待不就和〈未央草〉與〈狂奔〉如出一轍？

（二）從詩化到大眾化

明朗基調除了顯現於戰鬥哲學，也反映在語言形式上。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即創造了跳躍、斷裂、破碎的構句，躁鬱、狐疑、顛狂的語調及陰森、尖銳的意象，而到了《野草》，這種狂譫式的詩話成分更集中體現。具體而言，《野草》採用了詰屈贅牙的長句，以及存古但又不符中文舊習慣的表達，製造「陌生化」的表達效果。¹¹² 然而，到了雲里風筆下，明白曉暢的語句、樸實無華的白話取代了一切。試從〈影的告別〉和〈未央草〉摘取片段：

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會吞并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沒。

然而我終於彷徨于明暗之間，我不知道是黃昏還是黎明。¹¹³

我為了朋友們的漸漸疏遠感到心靈上的空虛，但卻為我身邊的影子感到無比的倨傲。

所以我寧願離開世俗的朋友們，而不願離開我身邊的影子，不管我要去那裏，不管我走到什麼地方，我總要把我的影子永恆的帶在我的身旁，於是我感到倨傲，我向人們誇耀著，你們看，我是個有影子而又信仰影子的人。¹¹⁴

110 雲里風，〈慶祝一座精神堡壘的築成〉，頁 102。

111 雲里風，〈拿起我們的棍子〉，頁 97。

112 以上討論見劉正忠，〈摩羅，志怪，民俗：魯迅詩學的非理性視域〉，《清華學報》39.3(2009.9): 460-461。

113 魯迅，〈影的告別〉，頁 170。

114 雲里風，〈未央草〉，頁 32。

〈影的告別〉在短短數句間用了三個「然而」，呈繁複纏繞狀，從中可見內心的掙扎及思想的矛盾與緊張。對於魯迅詩學，劉正忠曾結合「主體心靈／客體世界」的對照加以觀察，他提出，脫軌離場、混雜不純的表達，顯示魯迅正以其意念情感去對應變異、扭曲、瘋狂的中國。¹¹⁵ 以此對照，可發現，對理念深信不疑、相信光明就在不遠處的雲里風，採用恰的是直接、簡單的因果與轉折複句，效果近乎宣言，幾乎與魯迅背道而馳。另，魯迅另一篇散文詩〈秋夜〉也被引入、仿寫於〈未央草〉：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¹¹⁶

仰着頭，看那黑而高的天空，有許多的星星在眨眼，月亮卻不敢露臉，大概是黑雲窒死在暗流裏。¹¹⁷

在〈秋夜〉中，如劉正忠所言，魯迅以補綴式的句法，將「天空」和「奇怪而高」拆而復合，有力地再現了感知過程的阻抑感；¹¹⁸ 相對的，雲里風語序基本順直，如同上一例般，沒有魯迅的千迴百轉。遣詞用字上，他也一改「奇怪而高的天空」這種顯得累贅、不符中文習慣的形容，變為「黑而高的天空」。¹¹⁹ 這種句式、用字上的簡化、淺白化乃至「非詩化」，¹²⁰ 除了受限於個人能力及前文所提的社會文化資本，其實也響應了文壇「文藝大眾化」的主張。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社會、道德承擔往往重於文學審美，這種情況來到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馬華社會則更加嚴重，¹²¹ 何況，

115 劉正忠，〈摩羅，志怪，民俗：魯迅詩學的非理性視域〉：461。

116 魯迅，《魯迅全集》，卷 2〈秋夜〉，頁 166。

117 雲里風，〈未央草〉，頁 34。

118 劉正忠，〈摩羅，志怪，民俗：魯迅詩學的非理性視域〉：460。

119 同樣的，〈未央草〉也沒有〈秋夜〉「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這耐人尋味的表達。到了〈未央草〉，僅剩下「幾棵直而高的椰樹」。見雲里風，〈未央草〉，頁 34。

120 黃錦樹曾討論 1970-1980 年代馬華新詩的「非詩」問題，看似個案研究，實則可以解釋馬華文學很長一段時間詩意不足，功利性、戰鬥性過重的現象，以及馬來西亞華文文化總體貧乏的困境。見黃錦樹，〈論「非詩」〉，《中山人文學報》48(2020.1): 97-111。

121 許德發，〈文學如何「現實」？——馬華文學現實主義中的政治介面（1919-1930）〉：82。

馬華現實主義文學還受中國革命文學影響，¹²² 後者強調文學應服務於政治，階級應排在美學之前。這種「文藝大眾化」主張放下文人身段，用庶民大眾喜聞樂見、易於理解的語言和形式創作，讓文藝成為武器，鼓動大眾反抗。¹²³ 雲里風仿作的淺白易懂可謂上述主張下的產物。張潔宇認為，魯迅在《野草》構建幽深晦澀的意境，除了製造「陌生化」的美學效果，也避免將自己的「毒氣與鬼氣」傳染給人，很好地實現在表達自己和隱藏自己之間的平衡。¹²⁴ 以此對照，雲里風一改原作的艱澀複雜，採用明淨、直截、淺白的表達，確更有利於宣傳與教育。《野草》作為魯迅最具詩意的作品即是如此大幅度減少文學性，再加以冷戰風潮下文章的現實訴求、社會承擔，我們可說，雲里風的仿作實已脫離原作散文詩的文類，向雜文偏移。

五、結 論

雲里風說過一段病中與魯迅相遇的故事：

魯迅晚年不幸患上嚴重的肺病，他在抱病期間，仍然筆耕不輟，沒有喪失鬥志，這種精神深深地感動了我。我在 1954 年剛開始寫作不久，也患上了肺病，當時肺病正如現在的癌症一樣，是一種不治之症，所以我對人生頓感心灰意冷，認為不久就會離開人世了。為了醫治這種頑疾，我進了加影醫院 9 個月，住院期間除了傷心苦悶之外，也感到十分的寂寞與空虛，幸虧當時我向朋友借到了一套《魯迅全集》，於是利用這 9 個月的養病期間，把《魯迅全集》一字不漏地閱讀了兩遍。他的作品不但帶給我心靈上無比的慰安，也給我增加了不少抗病的鬥志，最後在新藥鏈黴素的配合之下，我終於戰勝了病魔，恢復健康，我在一篇小說《沖出雲圍的月亮》中曾經提到這件事。¹²⁵

122 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謝詩堅，《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1976）》。

123 黃錦樹，〈論「非詩」〉：104。

124 張潔宇，〈獨醒者與他的燈——魯迅〈野草〉細讀與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11。

125 雲里風，〈魯迅對新馬華人社會文化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肺病或肺結核在魯迅的年代或是「不治之症」，在 1950 年代的英屬南洋卻顯然不是。根據當時的報刊，鏈黴素於 1940 年代末期即已傳入馬來亞，¹²⁶ 1951 年甚至出現數量囤積的現象。¹²⁷ 雖然它應是雲里風病愈的關鍵，但在雲里風的認知與想象裡，鏈黴素僅有「配合」之用，真正的決定因素在於閱讀魯迅，以及更重要的，與魯迅戰鬥精神保持同步。這種強調與魯迅精神同在的論調在戰後馬華文壇所在多有：「只要他的英靈永遠和我同在／我將剋服一切障礙／我將戰勝牛鬼蛇神」¹²⁸、「要將魯迅的精神作為引導我們戰鬥的原動力，『有一分光，發一分熱』，踏著魯迅的格言前進」¹²⁹、「（魯迅）使我認識了自己，看到我自己的軟弱和缺陷，從而它給予我無限的鼓勵，哺育了我的戰鬥的勇敢」¹³⁰……人們在魯迅的影響下或走上街頭，或從事寫作。魯迅以及背後的整套認知結構一度讓他們獲得精神上的升華，其誇張程度甚至到了以為靠此即能治愈生理病痛的階段，這也難怪雲里風的《野草》仿作會如此光明，一掃原作的陰鬱氣氛。可以說，魯迅在馬華文壇基本以其戰鬥性著稱，其精神史意義遠超文學史。

方修曾將現實主義分成五種形態，其中魯迅是「徹底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的唯一代表，但此形態並非方修文學體系中最為「進步」的——方修也坦言魯迅「雖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卻也有其歷史的局限性」¹³¹——比之更高級的還有「新、舊現實主義過渡期」的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而這方面的「進步」又取決於是否「體現出勞動者的改造世界的意志與力量，或者展示出生活的遠景」、「成功地塑造出無產者的英雄形象」、「適合於工農大眾的理解與欣賞」。¹³² 這樣的要求若用以審核《野草》，魯

126 "Arrival of Rare Drug may Save Teacher's Life," *The Straits Times*, July 8, 1947, p. 7; "Don't Tax T.B. Gifts," *The Straits Times*, August 27, 1948, p. 6.

127 "Overstocks of Drugs, They Say," *The Straits Times*, August 3, 1951, p. 4.

128 江天，〈有一個人——紀念魯迅逝世十八周年〉，《魯迅讚》，頁 94。

129 漠青，〈魯迅與青年〉，頁 193。

130 金丁，〈魯迅精神〉，《風下周刊》97(1947.10): 114。

131 方修，〈馬華文學的主流——現實主義的發展〉，《馬華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新加坡：烘爐文藝企業公司，1976），頁 23。

132 同上註，頁 24。

迅恐怕連「徹底的批判的現實主義」也保不住。實則，《野草》自面世以來即受到各種批評和政治角度的詮釋。在中國，它一度被認為缺乏革命信仰、脫離社會現實主義、沉溺於個人主義，有者也透過論述淡化其虛無、孤獨和絕望，突出其革命性、戰鬥性。¹³³ 在馬華文壇，我們同樣可見到方修委婉批判《野草》的個人主義思想，¹³⁴ 1960年代也有知識人視魯迅的《野草》和《朝花夕拾》「裝以『匕首』和『炸彈』」、「遵循著這一條革命的、正確的道路前進」。¹³⁵ 當雲里風將魯迅最為消極、陰暗且富於詩意的《野草》改寫得如此充滿戰鬥性、樂觀且大眾化——無論有意還是無意——「有其歷史局限性」的魯迅突然不再停留在歷史裡，而能繼續前行，更符合（社會）現實主義的文學要求，更貼近馬華知識人對魯迅的戰士想像。決定記憶什麼和如何記憶的往往是團體，而非個人。而且，集體記憶往往未必反映過去的事實，它是一種以組構過去而使當前印象合理化的手段，一些無法滿足現實需求的過去只會被遺忘。¹³⁶ 冷戰年代，作為馬華知識人的反殖英雄，魯迅是以驍勇善戰的形象進入雲里風的視野的，而非黑暗、孤獨與悲觀的一面。在群體高歌猛進的路上，魯迅式的猶豫和彷徨只會被批為「感傷主義」、「失敗主義」，必須被剔除，雲里風的改寫就是一個剔除感傷和失敗的過程，然他所料未及的是，在此過程中，其呈現的魯迅面貌與《野草》已離原人原作越來越遠。張松建曾論及，雲里風「無力發展出魯迅那樣的錯綜複雜的思想，在關鍵點上偏離了《野草》的精神氣息」，¹³⁷ 前一句固然沒錯，後一句則實為時人所願意看到的。而且，除了考慮馬華作家本身的限度，我們也不能忽視當時的社會文壇條件與氛圍，如此才能有同情的理解。有別於前人以論述建構「南洋魯迅」像，雲里風

133 詳參（美）羅福林（Charles A. Laughlin）著，孫靜譯，〈永久的對立：魯迅《野草》的接受史及其修正〉：77-92。

134 方修，〈魯迅的思想〉，頁 83-85。

135 方皓，〈我們應該向魯迅學習些什麼？〉，《大學論壇》1962.11.14，第 8 版。

136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頁 23；汪民安主編，〈文化研究關鍵詞〉，頁 94。

137 張松建，〈國民性、個人主義與社會性別——新馬華文作家對魯迅經典的重寫〉，頁 39。

這種通過仿寫「恢復」、突出魯迅戰士形象的做法有其獨特性，在其他地區恐怕也不多見。何況，《野草》作為魯迅最黑暗、最具文學性的作品確也在雲里風的改寫下經歷極大的轉化，與小說、雜文的仿作相比，其轉化幅度明顯大得多。就此而言，《野草》仿作雖然在藝術上乏善可陳，但作為一個社會文化現象，值得進一步觀察。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 (日)丸尾常喜著,秦弓、孫麗華編譯 2009 《恥辱與恢復——《吶喊》與《野草》》,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丹 影 1949 〈倒下,又爬起!——魯迅先生逝世 13 周年紀念〉,《南僑日報》1949.10.21,第 8 版「南風」。
- 方 修 1960 《避席集》,新加坡:文藝出版社。
- 方 修 1976 《馬華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新加坡:烘爐文藝企業公司。
- 方 修 1978 《戰後馬華文學史初稿》,新加坡:T.K. Goh。
- 方 皓 1962 〈我們應該向魯迅學習些什麼?〉,《大學論壇》1962.11.14,第 8 版。
- 方美富 2019 〈被禁止的知識:馬來亞緊急狀態下知識人對抄檢左派政策的回應〉,《中山人文學報》47(2019.7): 21-52。
- 毛澤東 1949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延安:解放社。
- 王明珂 2013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王德威 2012 〈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臺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中國現代文學》22(2012.12): 8-35。
- 王潤華 2001 《華文後殖民文學:中國、東南亞的個案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
- (美)田浩(Hoyt Tillman)編 2009 《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古遠清 2001 〈魯迅精神在 20 世紀 50 年代的馬華文壇〉,《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7.5(2001.9): 58-59。
- 吐 虹 1954 〈想起魯迅的一句話〉,《南洋商報》1954.10.19,第 12 版「商餘」。
- 江 天 1991 《魯迅讚》,吉隆坡: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中心。

- 何 淀 1950 〈魯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祭〉，《文藝行列》4(1950.10): 2。
- 余 璋 2016 〈老紅軍王定烈：九死一生的草鞋將軍〉，《黨史縱覽》2016.2(2016.2): 11-17。
- 佚 名 1959 〈日本香港廉價鞋輸入影響下苦了補鞋工友〉，《星洲日報》1959.10.23，第8版「本地新聞」。
- 佚 名 2013 〈毛澤東逆境中不忘群眾路線〉，《中國組織人事報》2013.12.6，第7版「史事通鑑」。
- 吳小保 2018 〈冷戰與馬來亞左翼（反）國語運動〉，《東南亞學刊》13.1(2018.4): 49-82。
- 李 松 2009 〈毛澤東的魯迅論〉，《中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5.4(2009.8): 557-562。
- 杏 影 1954 〈補白雜記〉，《南洋商報》1954.10.19，第8版「文風」。
- 汪民安主編 2013 《文化研究關鍵詞》，臺北：麥田出版公司。
- 林 苗 1950 〈魯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祭〉，《文藝行列》4(1950.10): 3。
- 金 丁 1947 〈從紀念魯迅聯想起來〉，《南僑日報》1947.10.18，第5版「魯迅逝世紀念特輯」。
- 金 丁 1947 〈魯迅精神〉，《風下周刊》97(1947.10): 114。
- 南治國 2003 〈旅行的阿 Q ——新馬華文文學中的阿 Q 形象談〉，《華文文學》54(2003.11): 42-49。
- 春 雷 1947 〈學習魯迅的戰鬥〉，《南僑日報》1947.10.21，第5版「青年週刊」。
- 秋 風 1947 〈魯迅不僅是文藝界的〉，《南僑日報》1947.10.15，第5版「文藝」。
- 胡 適 1918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4.4(1918.4): 6-23。
- 胡愈之 1947 〈假如魯迅來南洋〉，《風下周刊》97(1947.10): 111。
- 苗秀編 1971 《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第一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 夏濟安著，萬芷均等譯 2016 《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孫玉石 2001 《現實的與哲學的：魯迅《野草》重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桃 木 1947 〈應怎樣紀念魯迅先生〉，《南僑日報》1947.10.1，第5版「文藝」。
- 張松建 2013 《文心的異同：新馬華文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論集》，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

- 張康文 2020 〈「馬華魯迅」與「東亞魯迅」：對話的可能與不可能〉，《思想》39(2020.1): 187-200。
- 張潔宇 2013 《獨醒者與他的燈——魯迅〈野草〉細讀與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張鴻聲、朴宰雨編 2014 《世界魯迅與魯迅世界——媒介翻譯與現代性書寫》，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 章翰 1977 《魯迅與馬華新文藝》，新加坡：風華出版社。
- 莊華興 2020 〈魯迅在冷戰前期的馬來亞與新加坡〉，《思想》39(2020.1): 201-207。
- 莫干山 1950 〈魯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祭〉，《文藝行列》4(1950.10): 2。
- 許德發 2015 〈文學如何「現實」？——馬華文學現實主義中的政治介面（1919-1930）〉，《中國現代文學》28(2015.12): 71-90。
- 連士升 1950 〈魯迅先生——人民世紀的舵工〉，《文藝行列》4(1950.10): 7。
- 雲里風 1971 《夢囈集》，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
- 雲里風 1991 《文藝瑣談》，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
- 雲里風 2012 〈魯迅對新馬華人社會文化的影響〉，雪隆興安會館網站，2012.8.31，
<http://shingansk1.org.my/html/archives/790.html>（2020.8.9 上網檢索）。
- 雲裏風 1957 《黑色的牢門》，香港：文匯出版社。
- 馮雪峰 1981 《馮雪峰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黃錦樹 2015 《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臺北：麥田出版公司。
- 黃錦樹 2020 〈論「非詩」〉，《中山人文學報》48(2020.1): 97-111。
- 董總總務處 2001 《風雲激蕩一百八十年：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圖片集》，加影：馬拉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 漠青 1947 〈魯迅與青年〉，《風下周刊》97(1947.10): 193。
- 趙稀方 2019 《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香港：三聯書店。
- 魂 1955 〈向東南亞兄弟民族文化學習：紀念魯迅先生〉，《星洲日報》1955.10.19，第 4 版「青年園地」。
- 劉正忠 2009 〈摩羅，志怪，民俗：魯迅詩學的非理性視域〉，《清華學報》39.3(2009.9): 429-472。
- 劉永良 2016 〈陳添裕反穿草鞋 毛澤東有驚無險〉，《中國老區建設》2016.5(2016.

5): 57-58。

潔石 1947 〈魯迅之路〉，《南僑日報》1947.10.15，5版「文藝」。

編者 1950 〈編後話〉，《文藝行列》4(1950.10): 10。

鄭翊涵 2014 「魯迅對新馬華人社會的影響——二戰後至文革時期」，新加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本科論文。

魯迅著，何凝（瞿秋白）編 2001 《魯迅雜感選集》，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

魯迅 2005 《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魯虎 2014 《新馬華人的中國觀之研究：1949-1965》，新加坡：新躍大學新躍中華學術中心、八方文八方文藝創作室。

戴麗娟 2014 〈法國史家的記憶課題——近三十年的重要著作與討論〉，《思想史》3(2014.9): 191-240。

謝詩堅 2009 《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1976）》，檳城：韓江學院。

韓曉芹 2015 〈論馬華作家雲里風1950年代散文中的「魯迅筆法」〉，《玉溪師範學院學報》31.12(2015.12): 27-32。

（美）羅福林（Charles A. Laughlin）著，孫靜譯 2015 〈永久的對立：魯迅《野草》的接受史及其修正〉，《中國圖書評論》2015.4(2015.4): 77-92。

“Arrival of Rare Drug may Save Teacher’s Life.” *The Straits Times*, July 8, 1947, 6.

“Don’t Tax T.B. Gifts.” *The Straits Times*, August 27, 1948, 6.

Halbwachs, Maurice.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Overstocks of Drugs, They Say.” *The Straits Times*, August 3, 1951, 4.

Shih, Shu-mei, Chien-hsin Tsai, and Brian Bernards, ed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Tan, Chee-Beng.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Penerbit Fajar Bakti Sdn. Bhd, 1993.

A Fighting Nanyang Grass: On Yun Lifeng's Imitation of *Wild Grass*

Chong Kang Wen*

Abstract

Lu Xun 魯迅 (1881-1936) was undoubtedly the most influential modern Chinese writer in the arena of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70s, a remarkable influence which warrants further explor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present article focuses on Yun Lifeng's 雲里風 (1933-2018) imitation of Lu Xun's *Wild Grass* 野草, the former being authored in the 1950s, and analyzes its features as a rewritten work,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and writing objective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Wild Grass*, which reflects the complex thought, poetics, and darker side of Lu Xun, was transformed by Yun Lifeng into "martial" or "combat" literature as a response to British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In recent scholarship, the movement of literature across borders as well as literary changes taking place within specific spatial and temporal contexts have receiv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It is noteworthy, however, that the Nanyang *Wild Grass* presents dramatic changes in terms of framework, theme, and tone; moreover, Yun Lifeng shifts its genre from a collection of prose poems to essays.

Firstly, the colonial context of British Malaya is outlined. By analyzing primary resources neglected by previous studies, such a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he present article then illustrates how intellectuals shaped Lu Xun into an anti-colonial fighter. Based on the above discussion, this article turns its attention towards the imitation of *Wild Grass* and examines how it was (re)-created within a martial literary framework, an analysis which explores a specific Nanyang perspective and theme that was produced alongside this framework, namely, the dilemma of Malayan Chinese. Furthermore,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into changes of the philosophy of combat and writing style, how the imitation

* Chong Kang We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nuls the melancholic tone of the original work is explained.

Keywords: Lu Xun, Nanyang Lu Xun, *Wild Grass*, *Yecao* 野草,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imitation

